

扎根湘西

——我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十年

游祖智

2003 年 5 月

《扎根湘西》

——我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十年

游祖智

湘州新出准字(2003)第 22 号

湘西州精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电话:(0743)8222182



作者 游祖智



作者(右五)和北京、上海、贵阳、长沙的教授们一起登上张家界

十五從軍氣
濃江郎老邁夕
陽紅宣傳波論
持衡議服邦人
民建茂功身在
聖時不忘儉位
居安處倍思公
罔心下代少年
事教育鵬搏萬
里風

扎根湘西 陳葆桂

游祖智同志

彭秀模撰

陳葆桂書

彭秀模 撰 陳葆桂 書

作者的话

《扎根湘西》原载最近州市党史办主编的《峥嵘岁月》一书。此文曾在中央、省、州级报刊及互联网上发表，并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连在上海的一位五十年代的老朋友老专家看到后都有所感慨，专门向我表示问好。有些同志说，该文写得亲切实在，耐人寻味，但感觉篇幅短了一点。

为了回忆过去，展望未来，进一步建设好湘西，建设好吉首大学。在学校各级领导的热情支持之下，我特意以《扎根湘西》为主题，另选出在全国、省、州报刊发表过的、宣传湘西的、宣传学校办学事迹和经验的、特别是我离休以后撰写的一些文章，汇集成书，赠给新老领导、新老朋友，新老同事，希望大家给予指教。

至于我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过的一些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由于制作难度大、花费比较多，这里也就只好“割爱”了。

除了前面用显著位置刊登老教师彭秀模和老领导龚葆桂赠给我的诗词和书法以外，在后面还转登一些涉及我作品的有关评述，供参阅。

2003年5月

目 录

1、扎根湘西

——我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十年 (1-14)

2、跨入新世纪 迈出新步伐

——吉首大学成教学院工作纪实 (15-19)

3、抓特色,走自己的路

——1999 年吉首大学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的启迪
..... (20-24)

4、“三老”西行记 (25-29)

5、一切为了培养合格人才

——吉首大学成教学院狠抓教学质量侧记 (30-34)

6、**特写** 在那严峻的日子里 (35-38)

7、校报总编 任重道远

——1990 年 11 月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高校宣传
部长和校报总编大会上的发言 (39-44)

8、老教授的愿望 (45-47)

9、年轻教授的上进心 (48-50)

10、师范部重视在中老年教师中发展党员 (51-53)

11、《吉首大学报》评论员文章十一篇 (54-68)

12、沿着红专的道路前进

——对七八级化学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调查 (69-74)

13、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记省第三巡回医疗队在农村活动的片断 (75-81)

14、王家寨上的新社员

——州直文教战线下放干部的劳动锻炼生活 (82-83)

15、**特写** 在酉水河上 (84-86)

16、建设中的吉首镇 (87-88)

17、**特写** 新春的报告

——记著名画家亚明等同志在我州 (89-94)

18、“西北澧西见闻” 连载通讯七篇 (95-111)

19、好勤务员 好班长

——介绍泸溪县浦市邮电支局局长刘明宣的好作风

..... (112-120)

20、踏遍千山万岭 勘探地下宝藏

——访艰苦奋斗的澧北地质队 (121-126)

附录：有关文稿照登或摘登 (127-129)

①老教师彭秀模撰写的诗

②人民交通出版社《海员工人话十年》一书前言

③向宏业同志的批语

④《新闻出版报》的评述

⑤有感于《人民画报》编辑的《中国高等院校总览》吉首大学五

版彩照

⑥国家民委杨盛龙同志的来信

⑦《民族团结》杂志社石维斌的函件

⑧省群众文化艺术馆胡万卿的撰文

悠悠岁月

扎根湘西

——我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十年

游祖智

(一)参加剿匪斗争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多么动听的歌声哟！它吸引着千百万热血知识青年，追求解放，追求进步，追求光明。

1949年7月常德市刚解放时，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连续派飞机对城区进行轰炸，我家已经疏散下乡，唯独我没有走开，15岁就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我很高兴，这里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尤其是当官的平易近人，当时教导队大队长和教导员看到我年纪小，常叫我“小嘎子”，还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回答很干脆：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在常德东门教堂集训不久，就动员我们上湘西，这时父母亲犹豫了，说湘西土匪多，国民党都呆不住？还是不去为好。我却无所谓，不是说要解放全中国吗！出发的时候兵分两路，一路是每人发一枝枪跟解放军步行；另一路是女同志和小同志随首长坐军车，我自然是在后一路。果真湘西土匪多，汽车开到官庄一带，土匪就在山上大喊大叫：“解放军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他们喊得凶，但不敢下山。解放军的机枪就架在汽车头上，只要他们下山就开火消灭。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官庄，解放军战士站岗巡逻，而我们放心睡觉。第二天就到了沅陵县城，并把我们送到湘西军政干校继续学习了几个月。那时除了专职教员上小课外，上大课都是军领导，军

首长每隔两三天给我们讲一次全国解放的形势和湘西剿匪的形势,讲得一次比一次鼓舞人心。我们的校长就是军长曹里怀。我们学习的第一阶段是劳动课;第二阶段是政治理论课,包括社会发展史;第三阶段课程是清匪建政,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在沅陵太常村学习,同样常有土匪来捣乱。1949年底大部队已去解放西南,与沅陵交界的古丈土匪头子张平多次带信扬言要横扫沅陵城。当时的张平不可一世,有首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这个家伙很残暴,是湘西著名的杀人魔王。那个时候我们白天学习,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有一天我和区队长一起值班,半夜只听到邻近寨子上炮火响,等我们摸过去一打听,原来是死了人放鞭炮。当时区队长的机枪子弹都上了膛。这年底沅陵开万人大会公审枪决大土匪头子杨清璋,看到这个阵势,古丈张平再也不敢嚣张了。

1950年春,141师422团就遵命合围张平匪部,前后歼匪三千多名,并将匪首张平击毙在李家洞小里溪。这个好消息还在沅陵大街上贴出了大快人心的“号外”,真是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1950年3月我们学习结业,一千多名学员分配到湘西二十二个县。我被分配到乾城(吉首)县三区工作,当时的任务就是剿匪、反霸、征粮,其首要的是剿匪,那个时候哪里有工作队,那里就有战斗队,也就是说,我们与部队同志在一起清匪建政,而且自己也带着武器,不然无法保证安全。记得我们和部队驻扎在振武营福音堂的时候,东北大个子和南方小伙子们,彼此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一起学习,一起唱歌,一起包饺子,一起走访群众,军政关系亲如一家。当时我们的一切活动,却被土匪头子龙飞武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不敢碰我们,但又要经常递条子来威胁我们,说什么“某日某夜要下山拜访工作队和解放军,要当心你们的脑袋!”,署名司令龙飞武。看得出这是试探性吓唬人的,我们每天晚上也用机枪、长枪、连枪和手榴弹迎接着他们的“光临”。时过多日,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但

是有时老百姓个别跑来告诉我们,说头天赶场的时候,龙飞武的人与我们某同志或某战士擦肩而过。我们就连忙反问为什么当时不报告呢?他们申述的理由是怕土匪报复。刚解放时,土匪一般都混在群众中间,以此作为“保护伞”,外地人一时很难弄清楚。有一次一名战士赶场冲锋枪走了火,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弹,周围群众一阵子秩序混乱。土匪却以为解放军要抓人,不是乱跑,而是不约而同的往山上跑。这一下子土匪与群众的界线就很分明了。

当时的情况的确错综复杂,有的人越是想接近我们就越要在表面上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多数人却是有顾虑,他们受了“我们工作队是水,本地人是岩,水是要流走的”谣言影响;还有一种人是看着形势发展行事;另外一种人则是与土匪有牵连。有一次部队临时被调去集中围剿匪首梁光湘,当地土匪知道这一情况后扬言要“拜访工作队”,我们工作队男女六位同志感到人少力量小,于是决定天黑就转移,当晚从山下转到山上又转到杨田附近的时候,深夜发现桥下小溪沟里有人,那人手里拿的长把子好像是步枪?组长老谢走在前面第一个喊话:“什么人!”稍等没有回音,老谢的枪响了。我们的子弹也上了膛,跟着卧倒匍匐前进,忽听见桥下发出了妇女的哭声,原来她是捞鱼虾的,准备第二天去马颈坳赶场。后来我们赶去看她,幸好没有打中,我们又问她为什么不答话,她这才说出心里话,她误以为我们是路过的土匪。结果大家搞了一场虚惊。

面对这种打不开局面的情况,我们与部队同志多次研究了剿匪的对策:第一要充分发动群众,解除顾虑,揭发检举土匪的活动情况;第二是主动围剿土匪,狠狠打击其弱点,据我们了解,当时土匪有三怕,一怕“六〇”炮弹远距离往山头上掉,二怕冲锋枪近距离扫射,三怕解放军便衣队捉拿;第三是政策攻心,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我们的三条对策都很见效。振武营大山背后龙武有一个土匪

骨干,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悔过自首,经常积极主动给我们通风报信,使土匪武装屡遭创伤。然而土匪头子对他恨之入骨,扬言要活捉他。有一天清晨他悄悄跑回家取换洗衣服,不料被土匪发现了,他家立刻被团团围住,似乎滴水不漏。可是他急中生智,迅速脱下衣服给家人藏起,自己跳进连接猪栏的厕所大粪坑内,仅露出一个嘴巴通气。天刚亮大批土匪就进屋搜寻,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土匪很奇怪,以为跑掉了?骂天骂地地闹了一阵子就撤走了。这个故事,后来传遍村内外,至今当地还有些中年人说,过去常常听到长辈人讲述这一故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龙飞武再也没有捎条子来了,而且龙的老弟小头目龙飞三也被群众检举活捉,土匪内部矛盾日趋激化,互相猜疑,分崩离析。再过一段时间,连龙飞武本人也走投无路,放下武器投降了。

湘西各地剿匪同样势如破竹,1950年1月大部队从四川返回以后,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全歼土匪武装十多万人,基本上肃清了“百年匪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感谢党,普遍颂扬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这一伟大功绩。

(二)从事新闻工作

我在乡下参加剿匪建政不到五个月,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书记看到我还没有“三八”枪高,1950年7月份就把我调到县里筹办县广播站去了。当时我还不服气,后来看到推荐材料上写道:“小游同志聪明,有培养前途。”我反而高兴了。

县领导给我批百万(旧币)块钱,派我去长沙学习,我坐汽车行驶四天才到。在路上我怕掉钱都睡在汽车站候车室的座位上。经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短期培训,我回到县里办起了广播站。解放初期的交通极不方便,经常看不到新近的报纸,而我的工作却特别引人关注,全县召开万人大会,我把广播一架,响彻四面八方,歌声嘹亮,威力无比,

一人讲话,五万人都听得到,山里人感到高音喇叭很新奇。平时,我每天晚上抄收中央台、省台的新闻,加上本地新闻,我白天就刻写方块字,办起一张张油印广播报,并紧密配合党的中心进工作行宣传,这样一来连县主要领导也经常来过问我的工作情况。

1952年我参加了筹备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的工作,当时的环境很艰苦,连代表大会的会场都是临时搭的棚子,中央代表团团长带领中南歌舞团前来热烈祝贺,筹备大会的总负责人是周小舟,大会的一些主要材料,包括新闻报道,都要经过他亲自过目审查修改。大会结束以后我就被调去筹办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从《湘西日报》调来大队人马。那时,我看到报社一无所有,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县里的美制收音机和用具也搬到报社去了。对此县领导有意见,地区宣传部的领导就给我一顿批评,其实是做样子的,东西又未退回去,弄得我好想不通。我以为当时我虽不懂规矩,却为开办《团结报》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建国初期的国情,党号召“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走的就是刻苦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我十八岁就当上了报社的编辑记者,尽管那时编辑部也有不少解放前的大学生,而且一个个文质彬彬的,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却初生牛犊不怕虎,没经历多久,大家就公认我的新闻业务进步快,政治理论学习好,当时地直机关考试,报社总是名列前茅,我都在九十分以上,也算得上一个“小台柱”。1954年初吉首镇虽只有三千多人口,由于自治区的成立,一下就骤增到一万四千多人,其建设气势磅礴磅礴,我笔下“建设中的吉首镇”自然也日新月异。初当记者就写出不少优稿,一位年长大学生编辑说我是“化学脑袋”。

湘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由于旧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解放初期,广大城乡能够讲好汉话的人为数不多,特别是苗族地区,由于语言隔阂,当时

给我们工作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55 年报社编辑部开展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学苗语活动,由一位苗族编辑执教,每周学习三次,大家学习很用功也很热闹,从不迟到早退,如因事缺课都自觉补上。那时候我的专用笔记本记满了苗语词汇,而且很快就掌握了苗区的日常生活用语,这对我以后采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在苗区采写的“默戎夜明珠”、“活跃在苗乡的有线广播”、“苗家老汉麻老隆”、“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等新闻通讯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听说我们在学苗语,有一天经常在湘西采访的新华社苗族记者(我们的老熟人),专门跑到团结报来测试我们,当时我们之间用苗语对了不少的话,他为此感到很高兴。可是他最后却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你的苗语会话很不错,要不要我请你‘侬佳’呢?”因为我懂得“侬佳”在湖南苗族方言中不是好话,是“吃屎”的意思(只有贵州一带苗语“侬佳”才是吃饭)。我马上回答他说:“你讲话没有礼貌不文雅。”他接着又说:“你真行,能辨别出好听的话和不好听的话,这样别人就蒙骗不了你了。”

1959 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我自告奋勇去酉水河重点采访,从沅陵坐船走上游到保靖,一连五天五夜随船体验生活,我和船工们拉过纤、推过船、漂过滩,感受很深,随后我写的通讯:“在酉水河上”发表以后,省和中央报刊都转载了,并由人民交通出版社编入《海员工人话十年》一书,向全国发行。

党培养我,我更应为党争气分忧。1961 年为从正面反映困难时期党的调整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的转机,由总编辑带队,我和另一位记者在短时间内各采写系列通讯《西北澧西见闻》七篇,其宣传效果良好,得到了州主要领导和群众的赞扬。我们采取随访随记的方式,有重点、多角度地宣传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方针,明确提出山区生产要根据山区条件,实行田土经营并举、主杂生产并举,坚持按劳分配,推行包工包产等。八十年代省里专家看了《西北澧西见闻》评价很高,专家批语:“这在当时的宣传中还是很难得

的。通讯坚持用事实说话,选材也比较得体,有突出的事例介绍,也有综合面的情况概括,增强了通讯的可读性和说服力。同时,为适应报纸面向农村的需要,作者还很注意文字的通俗朴实,注意使用群众熟知的俗语、谚语和口头语。显示出一种朴素的语言风格。作者作为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采访能力,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的逐渐成熟,我感到做好党的新闻工作是不容易的,思想要敏锐,旗帜要鲜明,文字要流畅,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对待重要的问题,要慎重,要过得硬。1989年春夏风波,我在主编《吉首大学报》,当时全国各地集会游行,校园少数师生也很冲动,一些青年编辑面对这种情况不知如何办?我对他们说,有些大报小报跟着起哄,不要理它,我们听党中央的。同时我又从正面写了长篇通讯:“在那严峻的日子里”,表彰中文系85级同学自觉抵制动乱、潜心完成学业的事迹,曾引起很好的反响。后来这篇通讯被《大学生》杂志转载,《新闻出版报》也为此作了“患难方知大学生”的述评。

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路,在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两者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的话,那就要分析。因为新闻就是国家的大事,就是人民的大事,或者是群众关心的大事。而党和国家都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个问题不能唯上、唯下、唯书、唯我,而要唯实。一个新闻工作者最主要的修养,就是政治觉悟的敏感性。我搞新闻宣传工作,自感基础比较差,常常就仔细寻找自己的不足,哪怕察觉有一时的自满,都不会原谅自己,何况宣传和新闻都是涉及面很广、学问很深的专业。所以我总是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教诲: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我扎根湘西,尽管也有过几次调动,但转来转去还是在新闻与宣传战线上,并始终热衷于具体的工作,也算得上专业化了。现在我离岗了仍握着笔杆子,挎着自己买的照相机。正由于我这一辈子干老行,才使我在政治上能够基本合格,理论文化水平上得到不

断提高,也才有一技之长。我很欣慰,在旧社会我没有可能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而在新中国我从长期实践中却获得了一张“中华全国老新闻工作者”的荣誉证书和一个列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的“中国摄影家”的光荣称号,这些对于拿钱买“实惠”的人,也许算不得什么,对于“唯学历者”也无法理解。然而在我的眼里却始终是最宝贵的“财富”,这“财富”是在实践中用勤奋换来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没有虚假的东西才是实在的、有价值的,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00年这一年,我在《中国成人教育》第八期发表“跨入新世纪,迈出新步伐”、在《民族团结》第十一期发表“随军进入大湘西”、在《民族论坛》第二期发表“抓特色,走自己的路”、在《湖南文史》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和照片。2001年以后,我在各级报刊上同样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照片,并获得各种奖励,评上优秀论文。这些常常使我乐在其中,继续着意耕耘。

(三)在宣传战线上

我搞宣传工作,大体上是在两个重要时期,一是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二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但因为都还是党的领导,作为共产党员,只能遵命行事。不过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这就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工作是比较复杂的,尽管那时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开始宣传革命委员会好。但是派性仍然很严重,下面武斗时常有所发生,机关单位并没有完全恢复上班,州革委还暂时在州老干所办公。上面“两报一刊”频繁地发表最高指示和文章,人们都已经厌倦夜以继日的欢呼游行。看来当时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左,也有正确思想在起作用,如若处理不当很容易“越轨出格”。但有一点我是明确的,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要去迎合气候图官,俗话

说,无私才能无畏。当时领导看到我出身好、成分好、年龄不大、工龄较长,又是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1968年8月就调我去州革命委员会担任宣传组副组长,主要负责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的工作。我想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担负这项工作既光荣又繁重。我当时积极忘我地工作,有一次领导派专车要我连夜带着电影公司的同志去泸溪县护送毛主席的“宝片”,小车开到潭溪地带,伸手不见五指,一边是山,一边是河,突然司机打瞌睡惊醒,赶紧来了一个急刹车急转弯,一下把我抛到车外四米多远。汽车正好卡在河坎的一兜大树上,没有冲下河,车上的同志安然无恙。而他们却不知道我抛到何处去了?打手电筒四处寻找,原来发现我躺在公路边上一动不动,双手还抱着“宝片”。大家跑过去立即把我抬上了另一辆小车,又继续前进,晚上十二点多钟才赶到泸溪县城,迎候已久的广大干群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家等着观看“宝片”。

回到州里,州领导让我治疗休息了几天。那时的宣传工作,每年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组织和整理学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材料,省州县都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表彰大会,各地区的典型就如同“比武打擂台”,互相要比个高低。我州地处老少边区,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们总结的典型都生动感人。特别是1970年,我们有艰苦奋斗、战天坑、找水源的洛塔,有热爱毛主席的百岁苗族老人麻老二,有学习运用辩证法搞好工业生产的劳模胡德厚,还有学毛著与学文化相结合的下瓦水……,这些典型当时轰动全省,扬名全国。洛塔这个先进典型的事迹就曾登在《人民日报》一版的显著位置上。

过去我还经常要给领导起草一些重大事件的宣传提纲,比如“农业学大寨”、“修好湘黔、枝柳铁路”等等,但是我感到其中写得最快最好的是1973年5月“关于三支两军干部调回部队的宣传提纲”,开头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